

# 文革中的「外國造反派」

• 何 蜀

## 外國專家寫出「馬列主義大字報」

1966年6月1日毛澤東下令向全國公開宣傳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6月2日《人民日報》在發表這張大字報的同時還按毛澤東的批語發表了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在此「樣板」的啟示下，一時間大字報在全國鋪天蓋地湧現。在北京，有許多外國專家在新華社、中央廣播事業局、外文局、中央編譯局和一些大專院校、科研部門工作，他們大多是在國際風雲變幻中支持中國共產黨、敬仰毛澤東的，這時也響應號召，紛紛寫起大字報來。其中較著名的是1966年8月31日由唐春、司克、楊鎬、安·湯福金斯(均是化名)四位美國專家合寫的大字報，它後來被譽為「外國專家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可是，有關它的產生經過與原因卻很少有人知道。

直到1967年的一次紅衛兵集會上，這張大字報的其中一位作者寒春具體談到了寫作這張大字報的背景。她指出從1959年開始，外國專家在生活上受到特別照顧，與中國人民之間的距離越來越大，特別是在60年代以後，更有一整套的特殊待遇。而最使他們難以容忍的則是政治待遇的變化，「政治待遇上的第一個變化就是不許我們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旅行變得越來越受限制」，同中國工人甚至幹部的關係也疏遠了。1966年5月他們被調到北京後，情況更為嚴重，「剝奪了我們所有的政治生活」，「除了乘汽車外，我們不能到任何地方去」；「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就讓孩子們回家不許他們參加文化大革命」，整天就只有關在住宿的飯店房間裏，除了坐小汽車外，不許上街，不許去公園玩。她女兒的情緒因此變得反常，更向父母大罵：「打倒你們這些美國特務！」在這種情況下，她給外事局寫了一封長信，談到給外國專家的這種待遇是錯誤和有害的。她說：「7月17日晚有位副局長來看我們。雖然他的態度很熱情，可是他對我們提出的為甚麼硬把外國人推向修正主義道路上去這個問題，根本沒有給予

在北京，有許多外國專家響應號召，紛紛寫起大字報來。其中較著名的是1966年8月31日由唐春、司克、楊鎬、安·湯福金斯(均是化名)四位美國專家合寫的大字報，它後來被譽為「外國專家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

滿意的答覆。……解釋了半天，歸根結底就是一個詞兒『安全』。」這位外國專家感到這種「令人罕見的政治壓迫的氣氛」是不能容忍的，在當時的大氣候下，她自然將這些問題聯想成是有人「明目張膽地用資產階級民族主義來全面攻擊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於是，在紅衛兵運動爆發後，他們受到鼓舞，便寫出了那張大字報①。

此外，在1967年3月22日的《人民日報》上有一篇報導寒春的文章，題為〈在毛澤東思想大學校裏成長——訪問一位在中國工作的美國女專家〉，文中亦提到了寒春和她的丈夫陽早參加寫作這張大字報的事：

在這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中，寒春同志和她的全家人都強烈地要求參加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八月底，她和她的愛人，還有另外兩位美國朋友一起，寫了一張大字報，表達了對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的無限熱愛，對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無限熱愛……。

但由於當時的報導並沒有披露大字報的具體內容，致令許多文革參加者與今天的人們只知有其事但卻無法得悉這張大字報的內容。因此，有必要將其轉引如下②：

#### 〈給外國專家局的大字報〉

為甚麼在世界革命的心臟工作的外國人被推上修正主義的道路？是哪個牛鬼蛇神指示的這種對外國人的待遇？為甚麼在中國工作的外國人，不論他是哪個階級，不論他對革命是甚麼態度，都受到這種「五無二有」的態度：

「五無」：

一、沒有體力勞動；二、沒有思想改造；三、沒有接觸工農的機會；四、不搞階級鬥爭；五、不搞生產鬥爭。

「二有」：

一、有高、特高的生活待遇；二、有各方面的特殊化。

制定這種待遇的是甚麼思想支配的？這不是毛澤東思想，這是赫魯曉夫的思想，這是修正主義的思想，這是剝削階級的思想。這樣做的目的是甚麼呢？結果又是甚麼呢？

1. 是要革命的外國人不能真正掌握毛澤東思想，只能在口頭上說條條；  
2. 使革命的外國人革命意志衰退，滑到修正主義的道路上去；3. 阻礙在中國的外國小孩成長為堅強的革命者；4. 把革命的外國人和他們的中國的階級弟兄隔離開，破壞他們之間的感情，破壞無產階級國際主義。

我們認為這不是個別人的問題，而是關係到世界革命的原則的問題，我們堅決反對這種待遇。我們決心要成為真正堅強的革命者，成為堅定的反修戰士。為了把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鬥爭進行到底，我們決心鍛煉和考驗我們自己。我們的後代必須成為堅強可靠的革命接班人，而決不允許他們變成為修正主義份子。因此，我們要求：1. 以階級兄弟看待我們，而不是以資產階級專家看待我們；2. 允許並鼓勵我們參加體力勞動；3. 幫助我們進行思想改造；4. 允許並

鼓勵我們緊密地結合工農群眾；5. 允許並鼓勵我們參加三大革命運動；6. 我們的孩子和中國的孩子，受到同樣的待遇和嚴格的要求；7. 生活待遇和同級的中國工作人員一樣；8. 取消特殊化。

只有這樣，我們才有可能成為毛主席所要求的革命者。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全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偉大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中國人民、世界無產階級及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同志萬歲！萬萬歲！

這張大字報很快就上報到最高領導層。1966年9月8日，毛澤東對這張大字報作了如下批示<sup>③</sup>：

我同意這張大字報。外國革命專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國人完全一樣，不許兩樣。凡自願的，一律同樣作。

寒春後來在一次紅衛兵集會上談到他們獲悉毛澤東批示後的心情時說<sup>④</sup>：

現在，我們聽到了毛主席的聲音！毛主席的聲音！毛主席的頭腦中沒有框框，他是全世界人民的解放者。他無限相信人民能夠自己解放自己。……毛主席只用幾個字就把反革命修正主義者的分裂世界無產階級的陰謀詭計砸個稀巴爛！我們擺脫了它！大門向我們敞開着了！現在靠我們自己去學游泳！

當時，外國專家所寫的大字報當然不只這一份。1966年10月9日的《人民日報》上報導了〈他們和我們並肩戰鬥——在京外國朋友熱情支持我國文化大革命〉，其中就提到許多外國專家都寫了「革命的大字報」。1967年4月17日《人民日報》以〈聽毛主席的話，學習白求恩〉為題，報導北京白求恩醫院一位英國骨科專家熱情參加文化大革命的情況：1966年秋天的一個夜晚，這位英國專家全家開了一個通宵的家庭會議，「他們堅決響應毛主席的偉大號召：『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他們決心起來造反，同中國同志一起造修正主義的反。於是，他們打破思想上的顧慮，寫了一張全家署名的大字報……」。可見，當時外國專家寫大字報的情況是很普遍的。

現在看來，這些大字報表現了外國專家對中國革命的一片赤誠之心。這正如當時在外文編譯局工作的法國專家戴妮絲在《愛是不會凋謝的》一書中所回憶的：她是因為敬佩毛澤東才擁護文化大革命的，她認為「他有勇氣抨擊自己領導的政黨，目的也許是通過『文化革命』為這個黨洗滌灰塵，使黨重新走上正確的道路」。戴妮絲還說：「我們有決心為革命的新發展而作出努力，甚至犧牲。」

總體來說，外國專家投身這場運動並不是為了個人私利，而是為了中國人民的利益，出於對毛澤東與中國共產黨的崇敬與信任，出於對理想主義的追求。他們不少人是在青年時代，在中國革命艱苦的「延安時期」就來到中國，像文革中反覆宣傳、奉為經典的〈紀念白求恩〉一文中所說的那樣：「一個外國人，

這些外國專家是因為敬佩毛澤東才擁護文化大革命的，認為「他有勇氣抨擊自己領導的政黨，目的也許是通過『文化革命』為這個黨洗滌灰塵，使黨重新走上正確的道路」。

毫無利己的動機，把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當作他自己的事業。」這確實反映了當時外國專家參與文化大革命的心情。

## 外國專家的「造反」組織與活動

紅衛兵運動興起之後，年輕幼稚的紅衛兵就急欲將造反之火燃向全世界，「讓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遍全球」，「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難的人民大眾」。當時在北京就有性急的學生打出了「國際紅衛兵中國支隊」的旗號。每天都有很多紅衛兵跑到外交部催促成立國際紅衛兵，有的年輕人還激烈地提出，若不盡快成立國際紅衛兵就會給無產階級世界革命造成損失，就是犯罪。一些外國留學生還向當時的中國外交部部長陳毅提出要回國組織紅衛兵，但受到陳毅的勸阻。紅衛兵想把文革之火燃向國外的天真意圖沒有真正實現，但是文革之火卻在中國境內特別在首都北京的外國專家中間燃了起來。

在毛澤東為前述四位外國專家所寫的大字報作出批示之後四天，定居北京的81歲高齡的著名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接受了紅衛兵贈送給她的袖章，成為一名「名譽紅衛兵」——她可能是外國專家中第一個「參加了組織」的「造反派」。1966年10月5日，《人民日報》刊登了戴着紅衛兵袖章的斯特朗請毛澤東

81歲高齡的著名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可能是外國專家中第一個「參加了組織」的「造反派」。圖為戴着紅衛兵袖章的斯特朗請毛澤東在她的《毛主席語錄》上簽名。



在她的《毛主席語錄》上簽名的照片。不久，在北京的外國專家也紛紛仿效中國同事們的作法，建立起「白求恩—延安戰鬥隊」、「國際燎原造反派」等造反組織。在北京舉行的一些重大集會上，開始出現了不同膚色的、在衣袖上戴着紅袖章的外國造反派的身影。1967年3月3日，《人民日報》關於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成立的報導中就有這樣一段話：

大會宣讀了由在京外國友人組成的毛澤東思想「白求恩—延安」造反團的賀信。紅衛兵代表們對國際戰士的祝賀報以極其熱烈的掌聲。

法國專家戴妮絲參加了這個「造反組織」，她回憶道：「外國專家也投身到運動中，參加了『白求恩—延安戰鬥隊』。這個名字既好聽又響亮，紅袖章上也寫上了這個名字。」<sup>⑤</sup>當時已擁有中國國籍、在外文出版社工作的美裔專家沙博里在他的回憶錄《一個美國人在中國》中也寫道：他先是參加了《中國文學》的一個戰鬥隊，「後來又參加了一個外國人組成的『革命』隊」。

1967年所謂的「一月風暴」奪權鬥爭開始之後，外國專家中的「造反派」也同中國的許多紅衛兵、造反派一樣，被捲入了瘋狂的旋渦裏，語言和行動都變得極「左」起來。當時紅衛兵、造反派有一個從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學來的常用口號，要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一位外國專家在「批判劉少奇」的發言中就別出心裁地提出：不僅要踏上一隻腳，而且要踏上兩隻腳。一隻腳，是因為他反對中國革命；另一隻腳，是因為他反對世界革命。

那個年代流行的捕風捉影、無限上綱的「階級鬥爭」方式，也影響了外國專家。據法國專家戴妮絲回憶當時進行的西班牙文版《毛主席語錄》的翻譯工作，因有兩位專家對某些詞彙的譯法產生分歧，致令出版時間被延誤了，這件事後來被上綱成「破壞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大罪。一天，外國專家的造反組織「白求恩—延安戰鬥隊」為此召開批判大會，戴妮絲聞訊後就去找她所在的戰鬥隊的頭頭，說明「這不是他們的錯，原因是翻譯過程中有改動。只要譯稿一準備好，外文出版社的人馬上就把它送到印刷廠，連星期天也是這樣！」但那位外國專家「造反派頭頭」聽不進去，回答說：「不管怎樣，這本書耽誤了。而且，不能打擊群眾的積極性。」<sup>⑥</sup>

當時外國專家造反派的鬥爭矛頭還指向了路易·艾黎和馬海德這樣的著名人士，韓素音曾有這樣的描述<sup>⑦</sup>：

居住在北京的西方人中，發生了奇怪的現象。想參加「文化大革命」的外僑成立了一個「白求恩」組織。他們把突然發現的革命熱情用到像路易·艾黎、馬海德這樣的在中國工作了幾十年的可靠的高尚的人身上。他們揭發路易是「特務」，與國民黨暗中有來往。路易受到「審查」，發現他曾寫過讚揚賀龍元帥的文章，還有一張他與賀龍的合影。朋友們再也不去看望他了，只有馬海德和另一位醫生，漢斯·米勒，他們經受了種種難以想像的壓力，始終與路易緊緊站在一起。這些外國人召開了「鬥爭會」，中國式的

在毛澤東為四位外國專家所寫的大字報作出批示之後不久，北京的外國專家紛紛建立起「白求恩—延安戰鬥隊」、「國際燎原造反派」等造反組織。在北京舉行的一些重大集會上，開始出現了不同膚色的、在衣袖上戴着紅袖章的外國造反派的身影。

鬥爭會，批判路易。後來，他的一些書也被銷毀了。這些西方人，其中也有美國人，表現出的惡毒——沒有別的詞來描述——是群體性精神變態的一個可怕的實例。「你應當看看他們當時的那個樣子」，幾年後路易溫和地笑着對我說：「他們就像無知的孩子，眼睛都瞪出來了，噴着怒火。他們認為他們是站在革命的最前列。」

1967年「一月風暴」掀起後，外國專家「造反派」也參加了「奪權鬥爭」。其中最為有名的，莫過於當時在中央廣播事業局工作的美國專家李敦白參加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奪權」。

李敦白原是美國南方的共產黨員，出身名門卻「離經叛道」，17歲就參加工會和學生運動，支持黑人解放運動。1946年，他在為聯合國救濟總署駐華辦事處工作時，認識了周恩來。在周恩來的鼓勵下，他去了延安，受到毛澤東、朱德的親切接見。他從此留在中國解放區，熱情獻身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事業。儘管他在1949年初曾因蘇聯指責他是所謂「斯特朗國際間諜網」在中國的成員而含冤入獄達六年零三個月之久，但他出獄後仍然矢志不渝地為中國人民的革命和建設事業熱情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成了活躍於北京群眾組織間的風雲人物。《人民日報》1967年4月8日用了大半版的篇幅發表李敦白的文章〈中國文化大革命打開了通向共產主義的航道〉，在同月14日的《人民日報》關於〈首都科學技術界無產階級革命派大集會狠批反革命修正主義黑貨〉（即批判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的報導中，又大段報導了李敦白在會上的發言。一位既信仰馬克思主義又信奉羅馬天主教的外國經濟學家曾對韓素音說<sup>⑧</sup>：

「我已寫信給林彪」，她語氣非常堅決地說。她的兩個兒子對住在北京的外國人（英國人和美國人）及他們所起的作用極為不滿，百般挑剔。「你知道嗎？是一個叫做西德尼·里頓伯格（引者註：即李敦白）的美國人幾乎完全控制了中國的無線電廣播大權！」她憤憤不平地對我說。

在1967年春夏之間，外國專家的造反組織在北京十分活躍，從當時的紅衛兵小報上可看到他們的活動。比如由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主辦的《首都紅衛兵報》，在1967年2月14日出版的第29號上就報導：

外國在京朋友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他們組織了「白求恩—延安」戰鬥隊，貼出「祝賀革命造反派奪權！」和「為甚麼革命友誼賓館和資產階級的賓館沒有甚麼兩樣！」等大幅標語。

1967年5月6日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新北大》報第71期又報導：

5月2日下午，首都革命造反派在北京體育館召開了「最最熱烈慶祝毛主席的光輝著作《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5周年大會」。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聶元梓同志到會並講了話。國際共產主義戰士、美國朋友李敦白

1967年「一月風暴」掀起後，外國專家「造反派」也參加了「奪權鬥爭」。其中最為有名的，莫過於當時在中央廣播事業局工作的美國專家李敦白參加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奪權」。

同志，日本朋友、國際燎原戰鬥隊代表，非洲學習毛著小組代表，首都工代會、農代會的代表，北京工農兵文藝公社、上海芭蕾舞學校「白毛女」小組赴京演出團代表都發了言。

首都紅衛兵代表大會的著名組織之一、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主辦的《東方紅報》在1967年5月3日出版的第35期，報導了5月10日下午「首都革命派」召開追悼李全華「烈士」（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紅衛兵，5月6日在成都兩派群眾組織衝突中不幸中彈身亡）的大會情況，報導中提到出席大會的除了來自全國的造反派以外，還有「來自八個國家的幾十位國際友人」。此外還刊載了兩位外國專家（一位是「白求恩—延安造反團」代表，法國女專家，另一位是「國際燎原造反隊」代表，日本專家）的發言全文和他們發言時的照片。在發言中，這些外國造反派都慷慨激昂地譴責了「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罪行」，表示要同中國的「紅色造反者」團結在一起、戰鬥在一起，奪取文化大革命的最後勝利，並爭取「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在全世界的勝利。

官方的《人民日報》對外國專家「造反派」也時有報導，比如1967年5月17日報導〈首都四十萬革命群眾到英國代辦處前示威〉中便提到：「今天，一些在京國際友人和外國專家，也和首都的革命群眾一起來到了英國代辦處門前示威遊行，他們用不同的語言高呼口號……。」

當時這種逢會必請「外國造反派」參加並邀其上台發言的作法在北京風靡一時，成為一種時髦，甚至使得一向支持紅衛兵、造反派過激舉動的江青，也在一次接見紅衛兵時滿懷醋意地批評他們這樣作是「崇洋媚外」。

在紅衛兵、造反派捲入派性鬥爭之後，外國專家也身不由己被捲入其中，但他們並沒有把派性衝突發展為真刀真槍的武鬥。法國專家戴妮絲記述了由「白求恩—延安戰鬥隊」組織的一次反對武鬥的遊行示威<sup>⑩</sup>：

我們所在的戰鬥隊組織了一次大規模的遊行，我自告奮勇地參加了，而且戴上了紅臂章。我們竭盡全力地喊着，手裏揮動着標語或小旗子，「要文鬥，不要武鬥！」好像在背誦一段經文。我們的隊伍走得很快，我盡最大努力不讓自己掉隊。……這些膚色不同、年齡各異、來自眾多國度的外國人顯然是沒有私心，為了中國和毛主席的利益，他們把可能遭到毆打的危險置之度外。起初，人們對着我們微笑，後來就鼓掌表示支持。遊行在一片歡呼喝采聲中結束。

當時紅衛兵逢會必請「外國造反派」參加並邀其上台發言的作法在北京風靡一時，成為一種時髦，甚至使得一向支持紅衛兵、造反派過激舉動的江青，也在一次接見紅衛兵時滿懷醋意地批評他們這樣作是「崇洋媚外」。

## 「外國造反派」的挨鬥與平反

在中國幫助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外國專家參加文化大革命、參加「造反」，這是那個不正常年代裏才會發生的荒唐事。當年的中央文革小組重要成員王力在《傳記文學》1995年第5期上發表的〈「文革」第一年〉一文中，講了這樣一段有助於了解當時背景的話：

我不贊成主席要兄弟黨的人參加我國的「文化革命」，而且要「一視同仁」。我主張「內外有別」。我說，要兄弟黨參加我們的「文化大革命」，既不好要其他黨來解決我們黨的問題，也不好這大革命來解決其他黨的問題，這不合乎兄弟黨的關係準則。主席未置可否。

王力這裏講到的「主席要兄弟黨的人參加我國的『文化革命』，而且要『一視同仁』」，即是前面談到的毛澤東對外國專家「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批示（當時外國專家中有不少是美共、英共、法共黨員）。從這段話可以看出，文革前期外國專家的「造反」行動，是得到毛澤東支持的。

文革前期外國專家的「造反」行動，是得到毛澤東支持的。直到1967年9月開始清查和鎮壓所謂「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後，外國專家中的造反人物才紛紛被冠以「五一六份子」、「國際間諜」等罪名受到批鬥，有的被迫離開中國，有的被抓進監獄。

直到1967年9月開始清查和鎮壓所謂「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後，外國專家中的造反人物才紛紛被冠以「五一六份子」、「國際間諜」等罪名受到批鬥，有的被迫離開中國，有的被抓進監獄。在這些冤、假、錯案中，連一些外國專家的子女也受到牽連。韓素音就談到有一對外國專家夫婦的長女莫妮克從巴黎到中國來參加文化大革命，「認為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青春、自由和慈愛的盛大節日」，結果卻被以「帶回淫穢書籍」（普通的法國愛情小說）的罪名被關入監獄達三年之久。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現得較溫和的，如法國專家戴妮絲，也受到了「幽禁」般的對待，她說：「同事們都和外國人保持距離，躲着我們，甚至漸漸地發展到不講話了。他們像拋一塊骨頭一樣把工作扔到我們的桌子上，然後扭頭就走。」

直到林彪集團潰散之後，情況才有改變。1973年3月8日，在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和外國專家局聯合舉行的「慶祝三八國際婦女節」招待在京外國女專家和中國女專家的茶會上，周恩來嚴厲批判了「左」傾錯誤對外事務的干擾破壞，親自對在文革中被錯誤批鬥或被迫離開中國的外國專家致以歉意，外國專家陸續得到平反。當時中國的官方傳媒沒有報導這次招待會的實況，韓素音則作了如下記述<sup>⑩</sup>：

周恩來主持招待會，發表了令到會的專家終生難忘的講話。這是一次「打破常規」的講話，官方未予報導；對這種講話，中國常常這樣處理。但是參加招待會的人會寫信給他們在海外的朋友，會談論它。

周恩來說，林彪及其他「壞份子」利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混亂，幹了許多壞事；其中之一就是以莫須有的罪名，把西方人關進監獄。他代表中國政府向因此而受到折磨的西方人道歉，並保證為他們平反，採取補救措施。周然後走到幾張桌子前，同人們握手擁抱；其中有一名美國婦女，她確實吃了不少苦頭，然而她仍自願繼續在中國工作。她說：「我個人的遭遇事小……中國的前途和命運事大。」華西蒙說：「只要能把革命推向前進，周要我去坐牢，我也會心甘情願。」大衛·柯魯克說：「現在我對革命的複雜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們比以前更想留在中國。」大衛·柯魯克是英國人，被人捏造罪名，在監獄裏渡過了將近四年。

除柯魯克外，在這次茶會上得到周恩來親自賠禮道歉的還有曾參加「白求



恩—延安戰鬥隊」，後來被打成「國際間諜」的愛潑斯坦與丘茉莉夫婦、六旬高齡的英國專家夏庇若等。

在茶會上坐在周恩來身邊並第一個得到周恩來賠禮道歉的，是82歲的英國女專家露絲·史密斯。她曾參與創建英國共產黨，在文革前以71歲高齡來到中國，先後在外文局和新華社工作。她對中國革命滿懷熱忱，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她也積極參加，在1967年3月8日《人民日報》關於〈在京外國女專家熱烈讚頌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報導中，有一段她的專門報導，其中談到她的感想說：「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是我七十五歲的時候，在中國參加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生活在無產階級朝氣蓬勃的中國，使我感到恢復了青春，充滿了活力、信心和熱情。」然而她的純真熱情受到了嘲弄，很快她就從一個受讚揚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變成了受懷疑的人物，最後被迫回到英國。儘管受到不公正的對待，但她返英後仍不說中國的壞話。直到1971年她80歲大壽時，新華社記者代表周恩來去看望她，並轉達了邀其再到中國工作的意向。她才又高高興興地重返中國，並在此渡過餘生。

至於在文革中表現最積極的外國專家「造反派頭頭」李敦白，則因「案情重大」，一直被關到「四人幫」垮台後的1978年10月才獲得無罪釋放，平反昭雪。

在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以後，這些外國專家在政治上都得到了徹底平反，許多人至今還在為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熱情地工作着。

1973年3月8日，周恩來在一個茶會上嚴厲批判了「左」傾錯誤對外事工作的干擾破壞，親自對在「文革」中被錯誤批鬥或被迫離開中國的外國專家致以歉意，外國專家陸續得到平反。

### 註釋

①④ 首都紅代會人大三紅十五兵團：《一個美國專家對劉鄧反動路線的控訴——美國寒春同志發言》，轉引自《聾人風暴》（重慶，1967）。因是剪報，故無期號。

②③ 首都紅代會北京外國語學院紅旗戰鬥大隊《紅衛報》編輯部：〈國際友人批《修養》〉（北京，1967）。

⑤⑥⑨ 戴妮絲·李—勒布雷頓：《愛是不會凋謝的》（北京：外文出版社，1989），頁216；217；218。

⑦⑧⑩ 韓素音：《再生鳳凰》（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頁69；52；206。

何 蜀 1948年生於重慶，初中畢業後因「家庭政治問題」輟學。曾任重慶人民廣播電台編輯，畢業於四川廣播電視大學中文類專科。1989年起任中共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紅岩春秋》雜誌編輯，現為副編審。著述有《霧城血》、《紅岩千秋》等。